

中国当代文学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
编写组

3

中国当代文学

华东师大·中国当代文学·第三辑

高倩·王文海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1234243

3

1234243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袁银昌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國當代文學

第三册

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集

第三册

梅文云山版社

(上集卷之四)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2 字数 448,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4月印 8次印刷

内蒙：63.631-63.830件

印加 63,001 - 62,000 加

ISBN 7-5321-0269-6/I·216 定价：7.20元

顾 问 冯 敏
主 编 王庆生
副主编 李逸涛
编写组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又平 王庆生 王国华 刘守华
张永健 陈家齐 陈道林 李逸涛
徐纪明 黄济华 程文超
参加编写者 丁永淮 王 卉 王先需
尹均生 江少川 孙 丹
刘安海 汪文汉 邱紫华
张启社 蒋松源

目 录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 1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摧残	3
一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	4
二	“革命样板戏”及唯心主义创作论	11
三	“四人帮”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 反动实质	16

第二章 十年浩劫中的文学创作 ······ 21

一	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的文学创作	21
二	文艺领域的春雷——天安门诗歌运动	29

第四编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

(1976年10月—1986年10月) ······ 35

第一章	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37
一	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	37
二	第四次文代会后的文学发展态势	46
三	文学创作的重大成就	54
四	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66

• 1 •

五	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争	76
(一)	关于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	76
(二)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	79
(三)	关于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84
(四)	关于现代派文艺问题	88
(五)	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	90
第二章	小说(上)	96
一	变革时代的小说业绩	96
二	开阔深邃的艺术视野	105
三	气度恢宏的艺术创新	114
第三章	小说(中)	123
一	王蒙、刘心武的小说	123
二	蒋子龙、张贤亮的小说	136
三	谌容、张洁的小说	145
四	陆文夫、高晓声、方之的小说	154
五	邓友梅、冯骥才的小说	164
六	李国文、从维熙、张弦的小说	172
七	李准、张一弓的小说	185
八	姚雪垠等的历史小说	194
九	徐怀中、李存葆、朱苏进的军事小说	205
第四章	小说(下)	215
一	韦君宜、茹志鹃、宗璞的小说	215
二	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陈建功的小说	225
三	周克芹、何士光的小说	239
四	古华、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的小说	246
五	贾平凹、柯云路的小说	260
六	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的小说	269

七	张承志、梁晓声、邓刚等的小说	279
八	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的小说	294
九	莫言、张炜、矫健的小说	303
第五章	诗歌	315
一	概述	315
二	艾青的“归来的歌”	325
三	曾卓、绿原、牛汉的诗	335
四	张志民、公刘、邵燕祥、李瑛的诗	342
五	流沙河、蔡其矫、林希、胡昭的诗	350
六	舒婷、雷抒雁、张学梦、杨牧的诗	359
七	黄永玉、刘征的诗	367
第六章	散文和报告文学	373
一	概述	373
二	巴金的《随想录》	386
三	丁玲的散文	394
四	孙犁的散文	400
五	徐迟的报告文学	404
六	黄宗英、柯岩、理由、陈祖芬的报告文学	413
七	乔迈、钱钢、李延国、刘亚洲的报告文学	428
第七章	戏剧文学	438
一	概述	438
二	陈白尘、吴祖光的剧作	450
三	高行健、苏叔阳、李龙云的剧作	458
四	沙叶新、马中骏、贾鸿源的剧作	467
五	崔德志、李杰的剧作	475
六	丁一三、赵寰、白桦的剧作	482
七	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川剧《巴山秀才》、	

莆仙戏《秋风辞》	490
第八章 电影文学	498
一 概述	498
二 《南昌起义》和《西安事变》	510
三 《巴山夜雨》和《天云山传奇》	516
四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野山》	523
五 《邻居》和《沙鸥》	531
六 《黄土地》和《黑炮事件》	536
第九章 少数民族文学	543
一 概述	543
二 诗歌创作	548
三 中、短篇小说创作	553
四 长篇小说创作	559
第十章 儿童文学	567
一 概述	567
二 小说创作	571
三 诗歌、散文创作	577
四 童话创作	582
五 戏剧和电影文学创作	588
结束语	596
后记	610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 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摧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我国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这场始于“文化”方面的“大革命”，实质上是“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们所攫取的权力，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十年间，他们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推行最反动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从“五四”到建国十七年间革命文艺的伟大成就，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这十年，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满目疮痍，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但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林彪、“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不可能完全阻止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极其艰难的逆境中，同他们展开了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终于以群众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同上书，第222页。

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迎来了十月的黎明。正如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所说的：“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①。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文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反思、总结十年动乱的历史的时候，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时代，便开始出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一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提出 “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场“革命”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早就开始，半年前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政治风暴来临的前奏。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为当时整顿工作作风、提倡“海瑞精神”提供借鉴而着手创作的历史剧，写的是明代隆庆年间应天巡抚海瑞除霸、退田、平冤狱的故事。作者在《前言》中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正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事隔多年以后，江青一伙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抛出了一篇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文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说剧本发表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反动势力联合反华，国内“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的退田、平冤狱实际上“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

^①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因此它“是一株毒草”。为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鸣，《人民日报》于11月29、30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由周恩来审定的按语。编者按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江青一伙对这一按语十分恼火，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施加压力。迫于高压，《人民日报》于12月19日发表了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尽管文章把批判的调子提得很高，江青一伙仍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随后，他们明确诬指“《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攻击庐山会议，为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从而把文化批判直接引向政治斗争。批判历史剧成了他们掀起一场政治动乱的“突破口”。

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把已经展开的政治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提纲》正确地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分清学术讨论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要搞成一场混战。2月12日，党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提纲”。但不久，因江青一伙作祟，党中央又批评了这个“提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不寻常的组织措施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严重危害全党、全国，埋下了深深的祸根。陈伯达大权在握，便在《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戚本禹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等文

章，批判的范围和调子都大大扩展和升级。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比对《海瑞罢官》等作品或专著的批判更为广泛。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加工、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这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

《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篡改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它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诬蔑文艺界在建国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骇人听闻地提出：“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把建国以来的某些文艺观点拼凑成“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诬称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纪要》指责大部分文艺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写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这表明作家队伍严重不纯，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的”，必须“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这样，《纪要》就把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文艺实践和文艺队伍涂成一片漆黑。

《纪要》还鼓吹“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诬蔑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

想”。十七年间所形成的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直接目的，是由他们去“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纪要》中把林彪无耻吹捧江青的话实写不误，十足暴露出这伙阴谋家的野心。十年动乱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纪要》是林彪、江青一伙全面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是利用文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宣言。

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各地贯彻执行。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首次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进一步宣布：“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从此，林彪、江青一伙推行《纪要》的活动更加有恃无恐。6月20日，由江青、张春桥授意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报告重申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必须进行“彻底清洗”。7月1日，《红旗》杂志在为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编者按里，点名诬称周扬是“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此，随意点名、揪斗作家、艺术家之风迅速蔓延全国。江青有一次讲话中一下子就点名批判了五十多部影片。解放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遭到查封。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艺术

家被定为“黑线人物”、“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抄家后投进“牛棚”，关进监狱，其中有些惨遭杀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就列举了二百人，这还仅仅是一部分知名人士。当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地方组织无一例外地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一律停刊。“黑线专政”论还肆无忌惮地套用于教育、新闻、科技、体育和出版等部门，公安、检察、司法和统战等系统，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自我爆炸”，实际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起到了促使人们从恶梦中惊醒的作用。而“四人帮”却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仅仅删去了林彪名字的《纪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逆流。1973年7月，他们把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列为“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进行批判；1974年初，制造了“黑画展览”和《三上桃峰》事件；1976年初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把影片《海霞》、《创业》诬指为“黑线回潮”的“典型”。直到“四人帮”垮台两年多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5月3日撤销了《纪要》，才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沉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中彻底解脱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纪要》，畅行无阻地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绝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具有多方面的深刻的根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新文艺运动一直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总是从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去要求、规范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文艺形势和任务相应地发生变化，文艺工作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战争年代激烈的阶级对抗观点来考察文艺问题，简单地判定文艺队伍的阶级归属，就常常会对文艺形势、文艺队伍作出错误的估计和简单、武断的决断。建国伊始首次发生的文艺论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即出自“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① 的不符实际的估计。此后，围绕《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胡风的文艺思想，某些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文艺作品，一再发生了严重的过火的政治斗争，划出了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对文艺形势、文艺队伍的错误估计愈见严重，及至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的两次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更是明确断言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工作至今“收效甚微”，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绝大多数文艺团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② 后来又强调要把“混进”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③ 从十多年来错误估计文艺队伍、文艺工作的基础上，林彪、江青一伙稍作发挥就炮制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得以在文艺界长期肆虐。

对文艺队伍的错误估计和“左”倾文艺思潮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互为因果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更是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这样就无视文

①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②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毛泽东论文艺》第226、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8—809页。